《续西行漫记》中的鲜活形象

■余海玉

经典重读

埃德加·斯诺1936年夏天到访保安（今延安市志丹县）时，许多红军将士还没有抵达陕北。1937年4月，埃德加·斯诺的妻子海伦·斯诺，冲破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奔赴延安，成为早期进入延安城区并对共产党领导下的边区和军队进行系统性采访的西方记者之一。

海伦·斯诺采访了毛泽东同志等60多位革命人物，并广泛接触了边区的战士、农民、工人和知识分子，拍下大量照片，写下大量采访笔记。她的右手因此落下永久性痉挛的后遗症。最终，海伦·斯诺以尼姆·威尔斯这一笔名完成《续西行漫记》的写作。1939年，上海“复社”推出首个中译本。2002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推出全译本。今天，重温此书，那些被忽略的细节，为我们理解长征、理解那一代共产党人的鲜活形象，提供了新的切入点。

海伦·斯诺的采访有一个显著特点：她不满足于记录宏大叙事，而是执着于捕捉那些承载着情感重量的细节。她对人物的观察带有女性记者特有的敏感与细腻。翻开《续西行漫记》，读者会看见中国共产党人的另一幅图景，那是革命者藏在粗布军装之下，属于一个个普通人的牵挂与坚守。

一

海伦·斯诺在红军前敌总指挥部采访时发现，彭德怀外表粗实，却有一颗炽热而温柔的心。他格外宠爱身边的“红小鬼”，称他们是“真正的小革命家”，而“红小鬼”们也非常崇拜他。彭德怀经常会在司令部里和“红小鬼”们进行辩论，和他们严肃地讨论军事战术。彭德怀向海伦·斯诺讲述过几个“红小鬼”的故事，给海伦·斯诺留下深刻印象。

彭德怀说，一个“红小鬼”在长征经过甘肃时掉队，被国民党士兵抓住。面对对方的辱骂，他慷慨陈词：“中国红军是唯一爱国的军队！”他还和国民党士兵辩论为什么要停止内战打日本。辩论中，国民党军队的长官败得很惨，颜面扫地，就命令人把这个“红小鬼”拉出去枪毙。这个孩子没有哭，没有求饶，只平静地反问：“你为什么枪毙我？为什么不砍我的头？好把那颗子弹省下来打日本人。”

这句话让行刑的士兵愣住了。原本奉命开枪的人，竟因这一句话而产生了分歧。“最后，那个孩子到底逃了出来，现在在这儿的红军里。”

这便是红军里的少年，年纪尚轻，却早已把民族大义刻进心里。彭德怀讲到这里，语气平淡，仿佛说的只是一件寻常事。这份平淡，藏着他对这些少年战士深沉的疼惜与由衷的骄傲。海伦记录这个故事时，也没有加任何评论，但正是这种记述方式，留给读者无尽的感慨和触动。

二

海伦在见到彭德怀前就和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陆定一有过交流。陆定一告诉海伦，斯诺离开陕北的时候把自己的照相机送给了他，他正在学如何使用这架照相机。同时，他得意地拿出了自己拍摄的“一张特别好的”照片给海伦看。满怀期待的海伦还以为是人物照，结果是陆定一拍摄的一枝梅花。他还把这张照片放大洗印了很多张，送给朋友挂在墙上。这让海伦惊讶不已，重新审视眼前的革命者：在残酷的战争岁月里，他心中从未丢掉对美、对生命的热爱。这朵梅花，正象征着革命者苦难之中不曾磨灭的诗意与希望。

随后，陆定一又拿出一张揉旧了的婴儿照片给海伦看，但他紧接着说：“这不是我的孩子，这是我在一本杂志里找到的。可是，很像他。”这番话让海伦陷入了沉默。

陆定一与唐义贞1929年在苏联结婚。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怀着身孕的唐义贞留在了中央苏区，生下男孩后忍痛送人抚养，后来唐义贞不幸被俘，受尽酷刑拷打，最终壮烈牺牲。

面对美国记者，陆定一展示出了鲜为人知的一面。海伦说自己后来常常想起陆定一描述的这个场景，但她落笔时没有渲染悲伤，只是记录了一个父亲在漫长行军途中反复凝视一张照片的动作。这个动作本身，比任何抒情都更沉重。它告诉人们：长征胜利从不只是宏大的叙事，它的背后是数不清的牺牲，是无数普通人在小家与大家之间做出的抉择。

三

作为女记者，海伦在书中专门开辟章节记录了蔡畅、康克清、刘群先、丁玲、李伯钊等女性革命者的故事。她们走出旧式家庭，扛枪、行军、宣传、救护伤员。在20世纪30年代，这样的中国女性，对于西方世界来说是完全陌生的。海伦以女性视角观察，记录她们的坚韧、聪慧，以及为民族解放付出的牺牲，打破了西方世界对中国女性的刻板偏见。

海伦采访了跟她睡在一个炕上的女红军李伯钊。李伯钊曾三过草地。她在剧团工作，写过很多剧本，深受群众喜爱。海伦在书中形容她：“生得娇小美丽，皮肤雪白晶莹。她真是个美人。”然而，残酷的现实是，李伯钊深受肺病折磨，“每天早上咯血”。

说起长征，李伯钊感慨：“在那极端困难的时期，我们没发过愁。但是现在回顾长征，倒有点后怕了。”李伯钊这句坦诚的感慨，褪去了传统叙事里的光环，让长征者的形象变得鲜活立体：他们不是无所畏惧，只是咬牙扛住了苦难。

当海伦想要为她拍照时，李伯钊拒绝了，并且给出了一个让海伦意外的答案：“怕万一有那么一天要到‘白区’去干秘密工作。”

一个刚刚走完长征、从事文艺工作的女性，面对镜头时的第一反应竟然不是留下自己的形象，而是考虑到这张照片可能给自己未来在敌占区工作带来的风险，一句话道尽了她随时准备转换战场的革命自觉。

四

在4个多月的采访中，海伦发现，红军并不像外界想象的那样闭塞和“土气”。她写道，红军战士“每个人都梦想在自己口袋上别一支钢笔，即使是不能用的也想得到一支”。她甚至被卷进了一场争论：是沃特曼牌钢笔好用，还是派克牌钢笔好用？这个细节微不足道，但极有穿透力：在物质极度匮乏的陕北，一支钢笔代表的是对“知识”和“现代性”的渴望。长征走过来的这些人，在用自己的方式定义文明。海伦还注意到，红军战士们也喜欢时髦的东西。当他们参加运动或演练时，每个人都愿意穿上适应运动场合的白色运动短裤和鲜红色、印有图案、两边还有条纹的上衣。

海伦在书中前言里写道：“对我来说，这是一次发现新事物的旅程——发现了一种新思想，一种新人物，正在地球上最古老最持恒的文明的中心所在，开辟着新天地。”在几十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回望那段历史时，需要的不只是纪念，还要有一种“重新发现”的能力。重温海伦的《续西行漫记》，我们能看见一个个鲜活温热的生命。书中那些革命者的赤诚、坚韧与家国情怀，穿越漫长时光，依然叩击人心，带给我们前行的力量。

新书评介

透过书信回望父母故事

■张仕文



军旅作家裘山山的新作《父母大人》（人民文学出版社）是一部讲述父母亲故事的作品。作者以上百封书信为线索，连接起父亲裘采畴、母亲徐前二人数十年起伏跌宕的人生轨迹，在漫长的岁月中展示了他们矢志不移的家国情怀，回溯了他们坚贞不渝的情感生活，触摸了他们怀瑾握瑜的精神世界。这本书不是传奇式的英雄叙事，而是一部朴素、真挚、细腻的非虚构作品。全书以书信、照片、档案和访谈相互印证，让历史在尘封中解冻，细节在岁月中显影，还原了有血有肉的父母形象，也还原了那个时代。

父亲裘采畴，1948年毕业于北洋大学土木工程系，是个有理想有朝气、积极追求进步的青年。1949年，他拒绝了去国外深造的机会，毅然投笔从戎，加入了铁道兵部队，成为这支新生部队的一名技术员。母亲徐前是一个小镇青年，在革命浪潮中果断走出家庭，报考了省新闻干部学校，加入革命队伍，成为省报编辑。

那时他们虽然已确定了恋爱关系，但出于对工作的热爱，他们都不愿意为了团聚而放弃事业。因此，两人开始了长达7年的爱情长跑。鸿雁传书，传递彼此的思念。那时车马慢，情很真，收信、读信成为他们最快乐的事情。为了避免丢失，他们给每封信都做了编号，标注了时间地点。

父母亲沐浴在新中国的阳光雨露下，将个人情感与国家情感紧密融合，将自己的青春和才华全部投入到建设新中国的事业中。他们的信里谈得最多的是各自的事业以及政治上的进步。

父亲身上最鲜明的军人气质，是坚定的信念和敬业精神。1951年初，他突然与母亲“失联”。几个月后，母亲收到信件才得知他已经“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铁道兵部队负责抗美援朝战场上重点铁路干线的抢修与维护，以确保交通畅通，保障兵员和给养按时送达。那时，志愿军防空力量薄弱，每天都面临敌人的狂轰滥炸。身边的战友今天还在抢修，明天可能就牺牲了。面对生死考验，裘采畴毫不畏惧，多次与战友冒着轰炸抢修铁路，履行铁道兵的使命。一次敌机轰炸，裘采畴发现桥梁上还有一台贵重的测量仪，他不顾危险，冲上去将仪器抱了下来。还有一次，为了摸清大宁江桥的桥墩被轰炸后有没有移位、裂缝是否严重，裘采畴不顾天寒地冻，潜入江中，围着桥墩反复勘察，连续数次下水，终于摸清了桥墩受损情况。上岸后，裘采畴冻得浑身战栗，无法说话，但内心充满自豪，因为他的勘察对桥墩修复起到了重要作用。

那时，母亲徐前一面揪着心，担心身在战场的未婚夫，另一面则恪尽职守，昼夜工作。徐前每天通过一台老旧的收音机收听前线战报，并及时向国内读者报道。这段时间，她多次写信给未婚夫，鼓励他，安慰他，支持他，一再告诉他，无论发生什么情况，她都会等他回来，叫他安心在前线工作。

对一名军人而言，信仰并不只是口号，而是在关键时刻敢于把个人安危置于国家需要之后的具体行动。铁道兵“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精神，在裘采畴身上体现为一种朴素的职业信念：路要修通，桥要架稳，任务必须完成。这样的信念没有华丽辞藻，却支撑着他走过战场、工地和漫长岁月。

作为军人，裘采畴用自己的知识和才华报效祖国。铁道兵从事的是高危作业，无论是在朝鲜战场，还是在归国后的铁路建设一线，裘采畴在工程安全、施工质量等方面都铁面无私，工程的每个细节都抠了又抠，严苛得近乎不近人情。他知道，一个微小的失误就可能毁掉一项工程，甚至危及战友生命。但当年轻技术干部遇到难题向他请教时，他马上又变得和蔼可亲，不厌其烦地悉心指导。这种“工作上严苛、困难时托底”的样子，正是一个有责任心的军人应该有的模样。

在家庭生活中，裘采畴同样体现出一个军人的责任与担当。军人家庭常常意味着离别、等待。他与徐前恋爱7年只见面5次，婚后依然分居两地，聚少离多。在战场上，裘采畴因担心牺牲提出与徐前分手，貌似“绝情”，实则是不愿拖累恋人。家，“不在某一个地方，而是在信上，在途中”。裘采畴没有因为身在部队而逃避家庭责任，相反，他用一封封信件传递关心、表达爱意，既有担当，亦有温度。

捧读《父母大人》，我们更能理解父辈那一代人的精神底色。他们把个人命运交给国家，把爱情放进“两地书”，把家庭责任扛在肩上，把军人信仰落实到日常工作中。军人的品格不只是坚强勇敢、不怕牺牲，还有爱和情义。这种爱，体现在爱祖国、爱人民、爱事业上，同时也体现在对家人的爱上。所谓侠骨柔肠，便是如此。

弹壳串起鱼水情

■李美桦

创作心语



我的家乡会理，是一片浸润着红色基因的热土。

1935年5月，中央红军从皎平渡巧渡金沙江进入四川会理，他们留下的红色精神财富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我家距皎平渡仅十几公里，在老一辈摆的有滋有味的“龙门阵”中，我听到了很多红军的故事。那一个个散落在民间的传奇是那样生动传神。那些镌刻于岁月深处的闪光瞬间，在时间的淘洗下愈发厚重丰盈，成为我创作的不竭动力和源泉。因此，我试图用手中的笔，艺术地再现这段历史，让那些扎根在大地上的红色精神，成为时光长河中永恒的记忆。讲述彝族少年和红军的故事的长篇小说《金色的弹壳》（四川民族出版社）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创作出来的。

创作灵感源于现实。此前，我多次前往皎平渡两岸以及红军走过的地方，走访了很多当地百姓，查阅了大量档案资料。当年，红军夜里成功抢占皎平渡，次日拂晓发起了攻打天险狮子山的战斗。干部团先遣连指导员孔开先身先士卒，在激战中身负重伤。大部队北上前，战友们将孔开先安置到彝族老乡家养伤，但因缺医少药，13天后，他永远留在了这片土地上。在生命最后时刻，孔开先得到了彝族同胞亲人般的呵护，这段鱼水情深的故事在当地传为佳话。站在孔开先烈士墓前，远山巍峨，大地苍茫，当年彝族老乡悉心照料伤员的情景仿佛就在眼前，我因此有了把这个故事用儿童文学的形式呈现给读者的冲动。

这本书讲述的故事，发生在红军渡过金沙江北上以后。3名红军伤员留在彝族老乡家养伤，少年乌萨和小锉子担负起了为他们提供食物的重任。儿童文学创作，最重要的是塑造真实可信的儿童形象，把故事里的角色写成活生生的人。我将小说主人公放在那个特殊的时代、特殊的环境中，通过他们的生活日常、喜怒哀乐、言谈举止，展示孩子率真自然的天性，借助孩子们的对话、动作、心理描写与环境渲染，体现乌萨和小锉子的机智勇敢，凸显故事应有的真实感与穿透力。我也着力讲述他们如何战胜恐惧与孤独、克服饥饿和疲劳，如何巧妙与敌人周旋，在步步惊心的故事中完成对生命与信仰的守护。两个少年的成长蜕变，就这样融入时代洪流与个人命运交织的壮阔画卷中。

乌萨最初的想法单纯而美好：地主康善人用弹壳做的烟嘴很漂亮，他也想用弹壳给阿普（爷爷）做个烟嘴。后来，乌萨在狮子山激战后只身来到战壕，捡到了他心心念念的弹壳，却因褂子被荆棘划破，弹壳不慎丢失。乌萨气得直哭，在他家做饭的红军给了他新的弹壳，弥补了他的遗憾。在乌萨不小心砸瘪弹壳伤心落泪时，又是红军伤员伸出援手，帮他做出了漂亮的烟嘴，实现了他的愿望。我努力用饱含温情的笔触，在一波三折的故事里，使这枚浸润着浓郁人间烟火味的弹壳，成为连接红军战士和英雄少年的情感纽带，成为军民鱼水深情的动人见证。

要让人物立起来，离不开典型的生活场景，更离不开鲜活的语言。我在书中适时穿插彝族谚语，为小说增添了一些地域风情。

红色儿童文学作品，是对红色历史的追忆，也是对未来的思考与启迪。当年，乌萨和小锉子在刀尖上行走，他俩期望的是美美地吃上一顿坨坨肉，放心睡上一个安稳觉。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与乌萨和小锉子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时代的少年儿童，远离战争、恐惧和饥饿，沐浴着时代的阳光雨露，在父母呵护和社会关爱下成长。回望历史，我们更应该珍惜当下来之不易的和平与幸福。

时光深处，那两个在深山密林中奔跑的身影早已远去，但那枚金色的弹壳、那些在烽火岁月中淬炼出来的精神、那份无比真挚而热切的鱼水深情，依然触动人心。

守望雪山下

■杨　舒

悦读分享

前段时间偶然在网上看到乔尔玛烈士陵园祭扫的视频。雪山环抱的墓园里，社会各界群众手捧菊花，在一座座墓碑前驻足默哀。人群中，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弯腰擦拭着碑面，动作轻缓，像是怕惊扰了长眠的烈士。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老人就是军旅作家党益民创作的报告文学《守望天山》（太白文艺出版社）的主人公陈俊贵。我从书架上将《守望天山》取了下来，轻翻书页，那段关于雪山、承诺与坚守的往事再次涌上心头。

20世纪70年代，为巩固国防、建设边疆，数万筑路官兵挺进天山修筑独库公路，雪崩、严寒、塌方时刻威胁着他们的生命。在一次执行任务途中，陈俊贵所在的小分队被困在暴雪中，粮尽路绝、命悬一线。生死关头，班长郑林书把最后一个馒头塞给了新兵陈俊贵。郑林书觉得，他和副班长罗强刚成为预备党员，而陈卫星是老兵，只有陈俊贵年龄最小，理应是被“照顾”的那个，而这种“照顾”就是“生的希望”。最终，班长郑林书与副班长罗强先后倒在了冰天雪地之中，陈俊贵和战友陈卫星则被牧民所救。陈俊贵因为严重冻伤，落下终身残疾。

伤残复员的陈俊贵受到讲述筑路部队事迹电影《天山行》的影响，作出了改变一生的决定：携妻带子远赴天山，为牺牲的班长和战友们守墓。对经历过生死考验的陈俊贵而言，天山深处才是他精神的家园。守在烈士墓旁，他仿佛还能和班长说说话，还能回到那段热血沸腾的岁月。在这里，他找到了自己生命的意义——烈士们为国捐躯，总该有人守着他们，让他们不孤单。

陈俊贵在雪山下一守就是几十年。这份执着让人感动。他守的是一座座墓碑，也是自己的精神家园，是当年筑路部队为之舍生忘死的军魂。

党益民的写作有报告文学的平实底色，没有刻意拔高人物，也没有堆砌煽情的辞藻。全书采用作者手记与当事人口述相结合的方式，记录了陈俊贵夫妇和儿女、地方干部、烈士亲属、昔日战友的口述，多重视角交相映照，勾勒出一个鲜活质朴、有血有肉的老兵形象。陈俊贵刚入伍时的心愿格外朴素，不过是能填饱肚子、吃上白面馒头，他带着这般朴素的期许踏入军营，又带着陪伴牺牲战友的淳朴想法，将青春与人生扎根在墓园。守墓的数十载光阴，更多的是平淡琐碎的日常：陈俊贵每天清晨都要去墓园走一圈，拂去碑面的积雪与浮尘；蹲在班长郑林书的墓前点上三支烟，念叨着“我没舍得抽，给你留着呢”，语气熟稔得仿佛战友从未走远；逢年过节，他便卷上铺盖守在墓旁，陪长眠的战友们过节。这些普普通通的日常片段，让这段跨越半生的守望更显厚重动人。正如作者在结尾手记里写的：“陈俊贵守望的不仅仅是班长给予他的那份恩情，更是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勇于牺牲、无私奉献、知恩图报，这些品质穿越时空，今天依然熠熠生辉。

《守望天山》写的是一个老兵的坚守，照见的却是一代军人的风骨。英雄从来不是抽象的符号。陈俊贵用半生时光告诉我们，英雄不只有冲锋陷阵的壮烈，也有平淡岁月里的默默坚守。雪山下的守望，守的是英灵，传的是精神。陈俊贵和他的战友们用青春和生命铸就的“天山精神”，早已融进这条天路的每一寸路基，也必将成为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永远流传。

迷彩书屋

长征

第6794期



视觉阅读　醒　狮（油画，中国美术馆藏）　路　璋作

这幅画创作于1984年。画家出身于一个铁路职工家庭，很早就有意识地把中国铁路工人斗争的历史展现在画布上。画作以北京长辛店铁路工人罢工斗争历史为依据，着重刻画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工人阶级群像。作品以瞬间的永恒表现了历史形象的典型性和特定历史环境的气氛，展现了工人阶级的力量。（刘佳霖辑）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34号　邮政编码：100832　查询电话：(010)66720114　发行电话：(010)68586350　定价每月20.80元　零售每份0.80元　承印单位：解放军报社印刷厂